

□林 晨
LIN Chen

空前抑或绝后

——1956年古琴采访

Unprecedented or Distinguish: Interview of Qin Zither Performers in 1956

摘 要:1956年4月17日至7月27日,查阜西、许健、王迪组成古琴采访小组在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所、广播事业管理局、艺术局的组织下,赴济南、青岛、南京、扬州、上海、武汉等地进行采访。期间,共采访81位琴人的285曲,收集文献资料32种、文物资料26种以及图片资料61张。该次采访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对全国古琴境况进行的调查,其成果、经验及教训对20世纪琴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古琴;采访;民族音乐研究所;查阜西;许健;王迪;吕骥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42(2008)03-0043-09

一、缘 起

20世纪50年代,古琴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首先,北京古琴研究会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①的下属单位于1954年10月成立,并于10月10日举行首次会议。其次,1954年10月22日至1955年1月12日,查阜西、蒋风之、管平湖、李庭松四名北京琴会会员参加“民间古典音乐全国巡回演出”。此次演出历经十大城市,“观众共计约十一万人(即一〇八七六人)。观众欢迎的情绪空前,一再要求‘再来’,不能停止。”(查阜西1961)此行不仅重拾琴人的信心,更坚定他们走出书斋,还音乐于人民的决心。1956年古琴采访就在这样的背景中悠然而来。

但是,古琴采访究竟始于怎样的因缘际会?根据

查阜西的《洩勃集》(1961)、《古琴音乐的收集与采访》(1995:421-430)以及《1956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查阜西执笔、许健、王迪1957:1-8)中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原因:

其一,1955年,吕骥受北京市教育局之托审阅所编辑的中小学音乐教材,发现教材“多自苏课本译来,惕然于国乐之遭际,预作回护,则惑于无资料可取,取资必先集资,因而想到采访。国乐有可采者又唯古琴,故促余为之。在1955自秋徂冬多方奔走始

收稿日期:2008-04-30

作者简介:林晨(1973-),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29)。

① 即现今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在音协、电台、艺局三方打通思想,引入预示。”(查阜西 1961)。因此,此行的最初动机是吕骥为使我国中小学音乐教材能涉及国乐之内容,遂有采录国乐以充实音乐课本的想法。而当时国乐景况零落,尚有保留的只有古琴。因吕骥与查阜西私交甚笃,故委托进行。可以说,古琴采访活动得以进行,实源于吕骥的真知灼见及其为此事的积极奔走。

其二,1953—1955年间,民族音乐研究所通过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古琴家联系,掌握以下有关古琴的材料:

1. 从六朝以来的刻本、稿本、印本古琴谱集共达一百三十九种,比较 1833 年到 1923 年著录的六十七种多出了七十二种。

2. 各谱集共记载不同名的琴曲 605 首,包括这 605 首它们的创作、改编和分派的古琴曲谱共计 2830 个。

3. 各地剩下的现存琴人不到一百人,他们尚能演奏的只有八十二曲;比较 1936 年上海一个古琴社的调查 220 人,已经减少了很多。(查阜西 1995:421)

中国音乐家协会鉴于以上情况并了解到许多琴家已有 70 高龄,且每年都有去世与瘫痪,遂于 1955 年协同文化部、广播事业局定下计划,收录这些琴家的演奏。由此可见,促成此行的第二个因素是民族音乐研究所于 1953 至 1955 年间对琴书、琴人所做的调查,而此调查正是奠定此行成功的基础。

其三,在中国音协与文化部、广播事业局计划收录琴家的演奏之后,查阜西自 1955 冬至 1956 春与 20 个地区琴人通信联系,请他们自己评定人选和曲选。根据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琴家的联系,发现“除了那些只有一两位琴人的地方可以由电台直接接洽收录之外,其他人多的地方,必须有人前往协助。此外,中国音乐家协会还希望能发掘出更多的琴人和有关古琴的材料如文献器物之类。”(同上:422)鉴于此,1956 年 4 月组织采访小组,“由文化部会同中国音乐家协会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调出专业古琴的干部许健、王迪和我一道前往各地进行这一工作。”(同上:422)因此,促成此行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各地电台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才能完成录音,同时,音协希望能更多地抢救、发掘、收集与古琴相关的材料。这里所言的“材料”包括实物资料、文献资料。

以上三个原因,使得查阜西、王迪、许健一行第

一次以官方的身份对古琴进行为期 99 天的采访。

二、行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许健的回忆:由于查阜西与各地琴家素有往来。因此,与琴家的书信往来多由其进行。至于通信内容主要请琴家评定人选和曲选,填写人选曲选预约表。然后由广播事业局与各地电台联系,商定录音相关事宜。20 世纪 50 年代,琴界萧条,琴人生活困苦,大多琴家的琴艺早已生疏荒废。事先与他们通信不但能调查其所会演奏的曲目、选定录制曲目,更重要的是,使琴家能得以时间练习恢复,以保证录音顺利进行。经过音协与广播局的同意,在预定的 18 个地方选择 10 个琴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他的地方通过信函,请当地广播电台、广播站直接与琴人接洽收录。出发前,查阜西等人确立以下工作项目:^②

1. 前往济南、南京、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重庆、贵阳、成都、西安 10 个省市协助电台进行录音工作,并机动发掘更多的琴人琴曲,必要时用自备的轻便录音机录下其演奏。

2. 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及藏书家接触,将善本、异本琴谱、琴书以及有关古琴历史器物转摹或制片以作研究古琴的资料。

3. 在可能和便利的情况下,与各地琴家及其他研究民族音乐的学者、艺人进行座谈会或欣赏会,学习他们的演奏,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和古琴家、古乐爱好者建立必要的交流和研究关系。

4. 详细记录每位琴家的简历、修养、生活状况并摄制照片,将此访问录存作分析参考资料,并在事后作为交流资料。

5. 详细记录特别知名的古琴并摄制照片,必要时补制拓片。

6. 录取稀见的古乐形式以作资料。

7. 在重点地方,如济南、南京、上海、武汉、成都等处,待机介绍民族音乐研究所领导、整理、发扬古琴音乐的成绩和经验。

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艺术局指示小组需及时了解琴家的生活、修养和健康,并转达政府对那些

^② 工作项目的资料来源于《1956 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以及《古琴音乐的收集与采访》。

年老贫困者的关心。音协也同时指示“对奏录古琴曲的人们,在尚未结付稿酬前,应机动地予以资助。”

(查阜西执笔、许健、王迪 1957: 1) 因此,此次古琴采访任务不只限于琴曲录音,而是机动地扩大到对古琴乃至古乐的采访与交流。从以下的日程以及成果中,这些行前制定的工作项目贯穿始终。

三、日 程

1956年4月17日,查阜西、许健、王迪一行携带小型录音机、照相机、几种征访表和问讯录从北京出发,踏上了采访的行程。根据查阜西《澹勃集》中的记载以及其他资料,汇集日程如下:

时 间	地 点	工 作 内 容	备 注
4月18—20日	济南,住山东宾馆。	18日晚王统照扶病主持座谈,洽晤詹澄秋、高松如等。	因广播局未联系,以胶带交请苗晶代录。
4月21—24日	南京,住福昌。	4月22日文化局黄克等召集带有演奏的座谈会,西乐家亦到。	钟仁淑办录音事宜。
4月25—27日	扬州,住萃园。	1. 文化科长于加后接待,与琴人座谈。2. 用自带录音机,试录刘少椿、胥桐华二曲。	
4月28日—5月2日	苏州,住裕社。	1. 文化局组织民乐演奏会。2. 电台用钢丝录音机录吴兰荪、吴兆基及汪星伯之曲	无座谈。
5月3—16日	上海,住沧洲。	1. 录今虞琴社社员琴曲。琴社之外,录卫仲乐、侯作吾各二曲。2. 读上海图书馆琴书善本,并计划转录。3. 5月12日上海音协召开古乐家座谈会。	
5月17—26日	杭州,住天华。	1. 同人民代表进行视察。2. 电台录张味真、孙慕唐、金致洪及徐元白夫妇创作的琴曲 3. 看文化局调来的天一阁《浙音释字琴谱》。	
5月23日晚、24日早	绍兴,住绍兴旅馆。	1. 见袁一洪、俞淑真、孙孟山、胡维谦四琴人,未录音。2. 游鲁迅故居。	袁一洪的丝弦为自制。
5月27—29日	黄山	视察。	沙德轩有琴人余之诚。住太平新辅乡,知其水平不高,未访。
5月30日	芜湖	作小汇报。	
5月31日—6月4日	合肥	1. 邀根如、计钟山、杨贤浩等来录音。2. 视察。	
6月5日	安庆	作汇报。	
6月6日	江新轮上		许健已在长沙工作完毕先赴重庆途中。
6月7—10日	汉口,住璇宫。	1. 录音。2. 6月9日巴南岗主持在群艺馆举行的交流演奏。	
6月11日	因开人民代表大会返京。		
6月12日—7月4日	北京	出席人代会,参加最后一次科学远景规划会。	

时 间	地 点	工 作 内 容	备 注
7月5日— 7月17日	成都,住总统 府街招待所。	1.了解各琴人的艺术简历。2.7月14—15日在 灌县,为民族音乐研究所访全真正韵,住青城山 一夕,在县府录全真正韵。	5日自京飞到,王迪7日赶到。
7月18日—20日	重庆	1.录音。2.发现《琴苑心传全编》。	未座谈。
7月20日—25日	西安	1.录音。2.由群艺馆召集座谈。3.录八仙庵独 到正韵,并发现《松声操》。	
7月27日	回到北京		

从日程的安排可以看出,查阜西一行除在途中以及返京参加人大会的时日外,分别在济南3天、南京4天、扬州3天、苏州5天、上海14天、杭州10天(其中绍兴2天)、黄山3天、芜湖1天、合肥5天(包含安庆1天)、武汉4天、成都13天(包括灌县2天)、重庆3天、西安6天以及许健在长沙工作的数日。除在上海、成都、杭州、合肥逗留的时日稍长外,其他地方都只逗留三至四日。其中扬州、苏州、绍兴、安徽最初并非列于计划之中,而是在采访过程中,听闻该地有很多琴人与资料,随机而定的。

每至一处,根据广播事业局的规定,与各地电台安排录音日程,录制完成后即由电台送至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制复本后,再送音协。虽然在途中曾使用随身携带的录音机对某些琴人进行录音,但据许健回忆:因录音效果不好,因此所有琴曲全部由电台录音设备录制。

座谈会的参与者不仅为古琴家,进而扩展至古乐研究者以及爱好者。座谈会内容包括交流演出;介绍管平湖、吴景略、徐卓诸先生研究出来的古曲;放奏管平湖发掘打谱的古曲《广陵散》,同时展出王迪听写的《广陵散》五线谱;许健改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奏的古琴合奏《流水》;展示民族音乐研究所复印的各种古谱指法集解,本次采访中计划录音的人选、曲选预约表以及国内现存琴谱和琴书的调查目录。这些项目基本反映了民族音乐研究所对古琴发掘、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作的尝试。这种交流性质的座谈会,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激起了琴家演奏、录音的情绪。如杭州张味真原先谢绝录音,但座谈会后竟录制了大曲《渔歌》。其次,发现了工作中的缺漏。王生香指出计划录音的人选、曲选表中遗漏了安徽的根如和尚,张正吟也同时指出

表中缺漏了扬州的刘少椿及胥桐华。根据这些线索,采访小组随机决定前往扬州、安徽二地。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从交流中获得启发。琴家以及音乐学者们在看到王迪记录的《广陵散》五线谱时,都表达了他们的兴奋之情,同时也希望在谱中反映指法中吟猱的细节。西安的一位青年音乐工作者甚至在参加座谈会后,改变了传统音乐不如西洋音乐的观念。“这些反应与启发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它们超出了我们原来期待的愿望——不只满足了‘知音’的要求,而且激发了音乐家对民族遗产的热爱,掀动了人们爱国主义的热情。”(查阜西执笔、许健、王迪 1957:7)

由于代表文化部、中国音协以及广播事业局,特别是查阜西的人大代表身份,使他们在各地都受到了殷勤的招待,并对其工作尽力协助。如济南、南京两地的文化局音工组织了带有演奏的座谈会;上海音协组织的古乐座谈会;今虞琴社组织的交流座谈会以及苏州文化局组织的民族音乐演奏会等等。这一切,都与查阜西等人的官方身份密切相关。

从前所述,可以发现1956年古琴收集、采访的方法与民族音乐研究所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收集、采访、记录、整理等实地考察活动一脉相承。都有以下特点:以集体采访小组为考察研究模式;问卷式的调查;事后撰写工作总结;以座谈会的方式进行采访考察;收集和翻译传统乐谱。

四、成 果

虽然此次的采访工作仅历时99天,但其成果数量之多,涵盖之广实是前所未见。论及成果,可分录音资料、实物资料、图片资料三部分。其中实物资料包括文献资料、文物资料两部分。另有《1956年古琴

采访小组访问表、通讯录》一份,为我们研究上世纪50年代琴人乃至琴界状况留下了宝贵资料。

(一) 录音资料

《琴曲目录》(即1956年古琴采访录音节目一览表)为《1956年古琴采访工作总结》的附表之一。虽然,“1956年古琴采访录音节目一览表”作为《古琴目录》的小标题,但目录并非只限于此次采访录音。根据《琴曲目录》的说明,可以看出目录的资料来源有四:

1. 各地电台录制的古琴曲目;
2. 民族音乐研究所的转录资料;
3. 1956年4月23日古琴演奏的实况录音;
4. 转录民族音乐研究所收藏的原查阜西藏百代公司唱片。

“说明”同时显示,此目录是截至1956年11月10日前所收到的录音目录。由于流程繁复,所有已录的胶带都是由各地电台留制复本后寄往中央电台汇收。因此,中央台查不出(或尚未收到)的很多,对于所缺失的乐曲,目录作了特殊记号以示标记。同时对各种来源,也都设计了相应的标记以示不同。

工作报告中,有这样的统计:“……使我们能于短短一百天的时间之内,把济南、南京、扬州、苏州、上海、杭州、安庆、滁县、南通^③、长沙、武汉、重庆、贵阳、成都、西安十五个地方七十五位古琴家的二百二十四曲收录了下来,又在同一时间之内,通过通信的联系,在青岛、广州、厦门、哈尔滨、沙市、南通等七个地方录下了十一位古琴家的三十八曲;共计二十个地方八十六位古琴家的二百六十二曲;奏录总时间在一千分钟以上。”(查阜西执笔、许健、王迪 1957:2)由于工作报告中的数据于资料未全之时统计而成,与后来辑录的《琴曲目录》颇有出入,笔者遂根据资料重新统计,以期得出一相对准确的结果。

涉及此数据的相关资料共有两份:一为《1956年古琴采访组琴人访问表、通讯录》中的“1956年录音的琴曲”一栏;一为《琴曲目录》(即1956年古琴采访录音节目一览表)。由于前者为《1956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油印本)的附录,成稿于1956年8月。而后者成稿于当年的11月,且标注详尽,故择其为此次统计文本,另增补《1956古琴采访小组所获资料一览表》中的“补遗”部分而成,现统计如下:

序号	地点	人数	曲数	备注
1	济南	3	18	14首为民族音乐研究所转录
2	南京	8	28	26曲未收到
3	扬州	2	16	
4	苏州	3	88	8曲未收到
5	上海	22	69	
6	南通	3	11	1曲未收到
7	无锡	1	4	4曲民族音乐研究所转录
8	杭州	6	19	
9	安徽	1	6	
10	安庆	1	2	
11	滁县	1	2	1曲未收到
12	长沙	4	6	
13	武汉	5	19	
14	重庆	4	16	2曲民族音乐研究所转录
15	贵阳	2	5	
16	成都	5	25	
17	西安	2	15	7曲未收到
18	哈尔滨	1	4	
19	青岛	2	2	
20	厦门	2	9	

③ 南通琴家的曲目为通信而得,此处的重复出现当为笔误。

序 号	地 点	人 数	曲 数	备 注
21	广州	3	15	
22	沙市	2	6	
23	北京	13	20	5 曲民族音乐研究所转录, 15 曲为实况录音
24	已故琴人	2	2	腊片转录
总 计		98	327	43 曲未收到, 25 曲民族音乐研究所转录, 15 曲实况录音, 2 首腊片转录

由上表可见, 目录分为济南、南京、扬州、苏州、上海、南通、无锡、杭州、安徽、安庆、滁县、长沙、武汉、重庆、贵阳、成都、西安、哈尔滨、青岛、厦门、广州、沙市、北京以及已故琴人 24 部分, 共收录 23 个地方 98 位琴人的 327 首琴曲。其中 25 首为民族音乐研究所转录, 15 首为古琴演奏会的实况录音, 另有已故琴人 2 人 2 曲。故 1956 年共采录 21 地 81 人 285 曲。其中小组采录济南、南京、扬州、苏州、上海、杭州、安徽、安庆、滁县、长沙、武汉、重庆、贵阳、成都、西安 15 地 68 人 238 曲。实收 196 曲, 42 曲未收到。同时, 通过信函联系, 于哈尔滨、青岛、厦门、广州、沙市、南通 6 地采录 13 人 47 曲, 其中 1 曲未收到, 实收 46 曲。

录音之余, 小组另采录“全真正韵示范录音”。该录音由青城、西安八仙庵的高公(道家领唱)演唱, 共“黄篆大斋”“跑马调”“双吊挂”“澄清韵”四唱。

(二) 实物资料

1956 年古琴采访的实物资料主要见于《古琴目录》(1956 古琴采访小组所获资料一览表)。表中的资料涉及民族音乐研究所未掌握或已经掌握但版本不同的资料, 是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文献和器物, 包括已经收集到的、见到的和访问到而尚未见到的在内。”根据统计, 表中涉及实物资料共 58 种, 分文献资料以及文物资料两大部分, 主要来源于各个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

1. 文献资料

由于文人的参与, 古琴文献的收集、记载一直颇受重视。自 1950 年始, 民族音乐研究所就对琴谱进行广泛收集。因此, 琴书、琴谱的收集工作是此次采访的主要任务之一。采访过程中, 小组成员访问了各地图书馆, 足迹遍及知名的藏书家、古书店, 收获颇丰。共得文献资料 32 种。其中琴谱 21 种, 琴学丛书

8 种以及非古琴类资料 3 种。其中值得注意的有:

(1) 发现宁波天一阁藏明初龚辑古所辑的刻本《浙音释字琴谱》。此书在《天一阁书目》中误为《臞仙神奇秘谱》, 经校勘, 发现实为“一部从未见过著录而又是很负盛名的先代琴家所辑的一个很有特点而又很丰富的材料。”(查阜西执笔、许健、王迪 1957:3)

(2) 发现清初孔兴诱所辑的刻本《琴苑心传》全编。此书为总结明代古琴音乐的巨著, 民国初年上海盐商周庆云藏有其孤本, 传为美国买去。民族音乐研究所曾动员国内琴家四处访求, 可惜未果。此次在重庆图书馆未编目架中发现《琴苑心传》的另一完本, 为研究明代古琴, 乃至明代音乐提供了重要资料。

(3) 访得清刻本《松声操》。此书为程雄于《松风阁琴谱》刊行十年后, 重新校正并补充另行刊本的一个精刻本。较《四库全书》本更为丰富, 特别是传统琴曲方面。

(4) 摘录善本琴谱。主要有周庆云原藏善本琴书 10 种中的 8 种; 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程瑶田校注的《吹幽录》; 上海藏书家胡公玄藏明刊本《玉梧琴谱》《五音琴谱》《古音正宗琴谱》。

(5) 收集知名琴人的遗稿。在西安发现了张友鹤的全部手稿以及史荫美的全部手稿, 为研究近代琴人保留了重要文献。

在收集、积累文献资料的工作中, 大都采用转抄、借抄的方式, 这在民族音乐研究所的采访工作中非常普遍。这些抄本成了音乐研究所的重要藏本之一。

2. 文物资料

20 世纪 50 年代, 音乐考古学虽未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出, 但音乐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文物资料的重要性, 同时, 有意或无意地运用音乐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几年来,在基本建设工程中有许多从汉、唐墓葬里出土的器物,在各种中心运动中民间的发现和捐献的古琴,集中到了各地的历史博物馆,有许多是可供古琴音乐研究的史料和致用的实物(查阜西执笔、许健、王迪:3-4)。

由于对文物资料的重视,采访小组深入各地博物馆的历史部门,“除了实地研究了知名全国的沂南百戏汉代石刻画像,成都王建墓伎乐浮雕,和济南、上海、四川等地许多唐代古琴之外,我们仔细地研究了重庆、成都、南京等处所藏的伎乐俑,其中大群抚琴、吹箫的陶俑都是在宝成铁路工程中所发现彭山汉墓群中出土的东汉明器。”(同上:4)此行共收集文物资料26种,涉及各个时期的绘画、陶俑、造像等。从中不但解答了琴史中的几个疑问,如肯定武梁祠中几幅横在膝上的弦乐器就是琴;东汉时的弹琴指法和现在的指法已经相同;东汉时琴箫合奏的形式就已存在等。同时,对当时现存名琴进行普查,并对照抗日以前各地琴家收藏的名琴,发现“基本都还存在,虽然有一些易了主,但是他们都另得到好的主人了。”(同上:4)

(三) 图片资料

图片资料主要集于《梅庐影集》之32、33、34,现藏于中央音乐学院查阜西纪念馆,另有部分散见于《1956年所获资料一览表》(见附录四),经统计,共61张。

类 别	张 数
琴 器	3
琴 人	29
采访工作照	13
考古实物照	14
风景照	2

由上表可知,图片资料可分琴器、琴人、采访工作照、考古实物照、风景照五类。琴器中涉及古琴4张,其中包括上海吴金祥所藏唐琴“九霄环佩”以及三张无名琴。琴人照片共29张,涉及南京、扬州、苏州、上海、杭州、安徽、武汉、成都、重庆等十地的琴人,其中题为“贫农琴人龙琴舫”的照片,更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琴人状况提供了有力的图片资料。

(四) 《1956年古琴采访小组访问表、通讯录》

《1956年古琴采访小组工作报告》(油印稿)的最后,附有《1956年古琴采访小组访问表、通讯录》。该

表格按城市分姓名、别号、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师承、1956年录音的曲目、未录及不熟练的琴曲以及地址10类。涉及琴人艺术简历的基本信息,是采访小组随身携带的访问表之一。

该表格由采访人员发给琴人填写,完毕后寄回。因此,有些琴人只进行了录音但表格未收到,这在附录中以“*”号标志。值得一说的是,最近看到在网上亦有一份与之类似的资料《一九五六年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全国琴人调查及录音汇编》,该汇编从类别上看,与访问表类似,只多“电话”一栏。内容也与访问表类似,只有北京琴人这一部分多于访问表。据笔者分析,访问表应是此汇编的母本,其中多出的部分琴人都出自北京。可能因北京是北京琴会的所在地,且下属于民族音乐研究所,对北京琴人的录音和采访相对方便,可随时增补。因此,在1956年古琴采访资料中反而忽视了北京。汇编中的北京琴人资料应为上传者自行增加。因无法得知其资料来源,故本文将以工作报告中的附录为蓝本,加以分析。

访问记录13个城市,64人579首琴曲。其中录制琴曲194首,未录制琴曲以及未熟练的琴曲285首。64人中,9人为女性,占总数的14%;55人为男性,占总数的86%,40至70岁的琴人占琴人的53%。(详见下表)

年 龄 段	人 数	比 率
15~20	2	3%
21~30	2	3%
31~40	3	5%
41~50	9	14%
51~60	15	23%
61~70	10	16%
70以上	5	8%
未收到访问表	18	28%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上世纪50年代琴人以男性为主,女性只占总数的14%,可谓寥寥无几,与现在琴人多为女性大不相同。同时,琴人的中坚力量为40岁至70岁之间,占总数的53%。但可贵的是,15至30岁之间的有4人,而这些琴人都为现代古琴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学生,许多已是当地乃至全国的知名琴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录的579首琴曲中,有《曙光操》《胜利旗帜处处飘》《胜利操》《春光好》《心经》

《黄水谣》以及《国歌》7首现代琴曲,占琴曲总数的1%。这些现代琴曲有的是由歌曲改编,如《黄水谣》《国歌》等,也有新创作的作品,如《曙光操》《胜利操》等。这些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古琴作品,是倡导古琴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发扬其“民主性”的必然产物。

五、结 语

“1956年古琴采访”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古琴为调查对象,通过官方对全国古琴艺术状况进行的调查,此次采访工作的成果、经验及教训对20世纪琴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956年古琴采访”是第一次官方对古琴艺术进行的调查。自古以来,古琴见载于诸多史书中,如《史记》《淮南子》《白虎通义》等。而编琴谱、治琴史也成为历代琴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古琴是现今唯一一个记载不断的乐器。但所有琴书都是琴人的个人行为,因此涉及面受到一定的限制。

“1956年古琴采访”则不同,它是由中国音协、艺术局、广播事业局以及民族音乐研究所四方合作而成,而这也是此次采访工作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

中国音乐家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音乐组织,通过与全国各地分会的联系,可较为容易获得各种与琴学资料相关的线索,为采访工作提供了方便。艺术局亦如此。采访过程中,他们安排当地的琴人以及音乐工作者与采访小组成员举行交流或座谈,介绍民族音乐研究所在古琴方面发掘、整理、改编创作的经验,同时听取意见,以求改进、完善。如前所述,这样的交流和座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举行交流座谈的同时,艺术局下属的艺术馆在得到通知后,预先派干部收集民族音乐谱集,为小组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成绩提供了可能性。陕西群众艺术馆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查阜西等人因未能在陕西图书馆找寻到一本琴谱而叹息时,陕西群众艺术馆“一次就搬出了五十多部的古琴谱集,给我们鉴定选择……使我们能在这五十多种书谱中,发现了清初程雄第二个谱集《松声操》和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琴师张友鹤的大批遗稿。”(查阜西执笔、许健、王迪 1957:8)

收录琴人的演奏录音是这次采访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在1956年那个时候,并无现今如此方便、易携带的录音机。采访小组携带的所谓“轻便录音机”,其实并不轻便。那是一种钢丝录音机,十分沉重,同时还需携带足够的钢丝带,其重量和工作强度可见

一斑。而且当时钢丝录音机的录音质量也不好。由于广播事业局的参与,古琴的录音工作就由各地广播台、广播站的设备录制。某些琴人较少的地方,就请有关站、台直接与琴人接洽。各地广播台、站录制完成后即由电台送至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制复本后,再送音协。因此,采访小组能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内录制数百首琴曲。

而民族音乐研究所是当时研究传统音乐的权威机构。自成立起,民族音乐研究所即进行了一系列民间音乐收集整理活动,而1956年的古琴采访活动也是其中的计划之一。民族音乐研究所进行的收集整理活动,都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古琴采访也延续了这一方式。且这次小组成员都来自民族音乐研究所。其中许健、王迪不但毕业于作曲系,熟谙西洋音乐,而且他们同时也是琴人,分别跟随管平湖、查阜西先生学习。如此背景,为采访中的收集整理带来了便利。

由此可见,“1956年古琴采访”之所以能够收获如此之丰,是与官方机构的参与密不可分的。

2.“1956年采访”所收集的资料是有史以来最为全面、珍贵的琴乐资料。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历代琴书编纂多“重古而薄今”,即重视对过往琴史、琴人、琴式、琴曲以及琴论等方面的记载,但忽略其所出时代的琴学现状。“1956年古琴采访”不但是第一次对当时的琴学现状进行普查,^④也是第一次在琴学领域运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为今后的琴学研究起到了范式作用。

如前所述,本次采访工作收集音响资料共21地81人285曲;文献资料32种;文物资料26种以及图片资料61种。通过这些资料,我们能看到上世纪50年代文献资料以及文物资料的现存状况;琴人的分布、传承以及所会琴曲情况。

这次采访所收集的资料,为以后许多书籍的出版提供了资料基础。1957年的《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历代琴人传》《传统造弦法》;1958年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1963年的《琴论缀新》《传统的造弦法》;特别是1963年由查阜西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都能看到1956年采访工作的影响。其中所涉及的善本琴谱多是此次采访工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同

^④ 《今虞琴刊》中亦附有琴人的调查表,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采访。

时也解决了某些琴学遗留的问题。

自1930年起,琴人的师承、渊源结合他们各自的演奏风格,各地琴人开始沿袭一些流派的名称。但是,一个流派的产生,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即必须有一批有代表性的琴曲、琴人以及琴谱。根据这一方法,结合采访所得的音响资料以及琴人简历,查阜西在其工作报告中给我们分析了当时琴人的流派分属状况,为我们研究上世纪50年代的琴人的渊源、传承以及流派特征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3.“1956年古琴采访”起到团结琴人的作用。自清中叶以后,就未曾有“内廷供奉”扬名于世了。上世纪的30年代,只有几个专业琴人在上海偶尔受到几个的富商照顾。至1939年最后一个“清客”李子昭也死于苏州文玩出口商周冠九的家中。自此以后,就只有一些半专业的“琴师”散落在各地。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其中的大多数人对古琴荒废了20乃至30余年,“直到解放后受到了国家文艺方针的鼓励才‘拾起来’的,很多人还是在去年音乐家协会托我去约请他们录音之后,才开始温习的。”(查阜西执笔、许健、王迪1957:3)可见,当时的琴坛是如何萧条。而1956年古琴采访却在此次给琴人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

自清末以后,琴人就从未得到重视。但是却在1956年,政府却派专人来录音,询问他们的艺术简历,“在每个地方把老年琴人陪送到电台去,耐心地掌握他们的情绪,耐心地听从他们三番五次地的返工重录。”(同上:8)据许健回忆:当时所有的琴人都很合作,并未遇见困难。当我问及原因时,许先生笑到:“之前都没有人理他们,突然连政府都派人去关心,哪有谁不会不高兴。”琴人的反映可见一斑。

当时,大多数琴人生活十分困苦,如张子谦只是

纱厂工人,今虞琴社时常为会费而发愁。鉴于此,采访之前,艺术局就曾指示查阜西说:“政府关怀那些年老贫病的古琴家们的生活、修养和健康情况。”音协也指出对那些录音的琴人,在尚未结付稿酬前,可机动地予以资助。这些政策,不但对琴人起到了安抚作用,也使地方政府从此开始重视古琴的恢复与发展。

自1956年古琴采访之后,许多琴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其中琴艺高超的得以从事其擅长的职业。如张子谦从纱厂转至上海民族乐团、汪孟舒也至民族音乐研究所从事古琴研究等。许多琴人在此之后,在当地得到了许多演出机会,使之有机会展示其专长。可惜,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这大好形势消失殆尽。

无可否认,作为里程碑式的1956年古琴采访工作,其成果对现今的琴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当我们再一次看待这次空前的采访工作时,当我们在赞叹前辈琴人策划之周详、思虑之深远时,当我们向查阜西、王迪、许健等前辈们表达我们的敬意时,我们是否更该考虑,1956年的古琴采访是否已经完成了琴学史料的采录与整理?如果没有,那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参考文献

- 查阜西(执笔)、许健、王迪
1957:《1956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G]《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第3集),北京:音乐出版社。
查阜西
1961:《澹韵集》[M]音乐研究所油印资料。
1995:《古琴音乐的收集和采访》[C]《查阜西琴学文粹》,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振涛)

书 讯

《多声世界——金经言音乐文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译审金经言,多年来翻译和著述的译文和论文汇编,售价45.00元。

欲购者请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春香联系。

电 话:(010)64813314

传 真:(010)64813314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一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邮 编:100029